

论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基于《中国文化》文本研究

徐晓光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1)

摘要:《中国文化》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机关报,是延安时期重要的综合性理论学术刊物,艾思奇是《中国文化》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在报刊中,艾思奇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正确性和中国的特殊性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可能及其能够实现的内外条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途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艾思奇;《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贡献

中图分类号:A 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18)02-0012-08

《中国文化》是延安时期重要的综合性理论学术刊物,其主要作者群涵盖了当时党内外众多知名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文化》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的艾思奇,在该刊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做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解答。艾思奇在该刊中的相关论述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程,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完善,还为当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但因不同国家和民族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的差异,不可能给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指明发展道路,所以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274}。但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被提出后就备受质疑,而在《中国文化》发行时期,党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对此更是争论不断。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中以叶青为首的“御用文人”们,更是不断发文认为,

中国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此,艾思奇系统性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6}中国需要不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一开始是非常幼稚的”^[3]。中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在本国预先将革命理论和方法孕育成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是通过国外传入介绍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平较低,运用的内容很多不适合中国实际,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初期多次出现实践挫折和理论指导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还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化的口号。”^[3]而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一方面,“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4]。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揭示社会发展和变革最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这个规律虽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进程、不同国家和民族以不同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但在任何特殊的条件和情况之中都能发现其中最一般的规律。所以,对待中国特殊的国情,也能够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这些

收稿日期:2017-08-24

基金项目:2017年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2017cxsj080)

作者简介:徐晓光(1990-),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E-mail:xxg1912@163.com

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4]。其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揭发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揭发了一般地有正确性、必然性的规律，所以它又是我们研究一切实际问题的指南。”^[4]对待中国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给予了看问题基本正确的观点，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即既要把握科学理论和原则，也要凭据这些理论和原则具体客观的研究问题。最后，马克思主义给无产阶级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斗争策略。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诞生和发展的，无产阶级活动给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的现实载体。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由于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内外反动势力进攻猖獗，党内外又充斥着各种错误思想的不断侵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全民族的抗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给予正确的解决方案。“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自己内部有着根源。”^[4]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无产阶级经过近二十多年的斗争，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极高的觉悟和完备的组织，有强有力的政党，有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成绩。所以，中国本身就一直都有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土壤。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需要有其特定的发展条件才能真正地实现和发展。从内部条件来看，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其能永葆生机和动力的根本原因。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光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所以马克思主义是时代性、科学性、批判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艾思奇在《什么是辩证法》一文里，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天然就带有与时俱进的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要求。其次，就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进行分析，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的一种体现。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以何种方式、何种道路，都有着共同的理论观点、立场和方法，也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为实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但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着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条件而采取这不同的表现形式的”^[4]。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依据中国的实际条件，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此推动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最后，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的是一个具体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则必须探究问题的实质。这一个个问题，主导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5]1515}。问题导向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内部条件。报刊发行时期，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实质则是需要回答革命的性质、目的、对象等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艾思奇则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从外部条件来看，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不断变化的，这包括党情、国情、世情、主客观形势和条件、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影响。这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不断加强实践，“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独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6]80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对照抄照搬从而陷入教条主义之中。而是要在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实践，适应问题的不断发展变化，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分离，“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4]。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探索，首先就要弄清楚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是什么，二是“化”出来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艾思奇在报刊之中，对此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1. 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化”两个命题的概念和关系,这就要求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本质的要求,也是根本前提。那么就很有必要去解答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什么去“化”。首先,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真正的中国化,就是要真正能够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要真正能‘理解、精通、应用……’马克思的理论。”^[4]运用的前提是理解,如果不能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则难以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其次,要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理论或者观点,都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去理解,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去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事物的内在运动是复杂的,也就是说,不是片面的,而是各方面的”^[7]。“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以客观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不能断章取义,任意曲解,也不能主观臆想,为我所用,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后,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一部分人,“倘若只会背诵旧的理论公式,倘若在任何条件之下仍只知道固执一定不变的论点,那就是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学说所要反对的”^[8]。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的研究认识常常要受到专门范围和经验范围的限制,常常因为只注意到自己有限范围内的问题,而忽视了更大范围内的事物的相互联系。”^[8]教条主义的产生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或者理论观点从整体中剥离出来,加以片面夸大化、绝对化,脱离实际变成教条。而经验主义则是过分扩大了实践经验的能动作用,忽视了理论指导的重要性。这一切的产生又与实用主义休戚相关,因为实用主义就是根据狭隘的利益要求和主观臆想,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考虑从诸多范畴、理论观点中来把握每一个范畴和理论观点在全部范畴和理论观点中的含义和地位,而是突出和夸大其中的某些自身需要的范畴、理论观点,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化、片面化和夸大化。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但要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更要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个完整的体系,正确地运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进行指导,反对实用主义和主观主义。

2. 正确把握中国实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化”什么,“化”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就需要回答“中国化”是什么,“中国化”的根本“问题是在于要能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并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而不是在于从名词上来争什么叫做‘化’,什么不是‘化’的问题”^[4]。而想要正确的去把握中国实际,就必须做到两点。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随着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变化的不同,必须要依据客观实际不断的变化,不断突破固有的思想限制。“人的思想行动,决定于他所生长的社会环境,不同环境之下的人,必有不同的特点。”^[9]而报刊发行时期,中国的革命形势处于抗战的相持阶段,这和抗战防御阶段大不相同,中国的革命分子必须要突破原有的革命理论,这就要求必须要解放思想,同时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条件依然落后。所以毛泽东这一时期所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就很好地把握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依据了客观的事实和解放思想的理论成果。第二,“革命中的一切错误,基本上都是由于不能够客观地看事物,不能依据客观事物具体的条件来看问题。”^[9]所以,要把握中国实际,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具体条件。而怎么得到这些条件,“我们还必须要坚守一个重要的约束,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赠给我们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0],就是要坚持调查和分析中国国情。只有不断地通过实践,不断通过调查了解中国的真正实际,以丰富的实践结果才能分析出中国的国情,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3. 不断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3]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需要不断研究中国的国情,把握所处时代的特点,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毛泽东曾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1]⁶³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

须要加强对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的重视，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将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展现出一个个具体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正确认清中国国情还需要把握所处时代的特征，正确分析党情、国情和世情，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所以，艾思奇强调必须要正确认识到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并且拥有普遍的，是事物自身运动变化，绝对的、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要运用运动变化的观点来看事物，表现为旧事物的不断更新、新事物的不断发展，形成事物的阶段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如此。报刊发行时期，中国革命的形势复杂多变，必须要正确认识、调查、分析和把握中国的实际、国情和革命的走向，认清时代特征，加强实践。正如艾思奇所说：“革命斗争的指导，就在于要能够正确把握一定的发展环节，并针对一定阶段的情况而采取一定的适当的战略策略。”^[12]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具体化、民族化。艾思奇等学者在文章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具体途径，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将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1.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

只有与中国的国情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其普遍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艾思奇强调：“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4]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需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具体的问题，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方针、

路线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而通过“结合”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准确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中国实际的具体特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同时要就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根据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不是机械地运用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践，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时间要求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正如艾思奇所说：“就必须依据新的实践条件来把既知的规律加以补充和发展，就是要把握更具体新的规律和新的理论原理。”^[8]另外，通过“结合”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人类社会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就是将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特定对象进行考察时得出的论断，有些结论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仍符合实际；有些结论当时是正确的，现在因为具体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了；还有些结论则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着重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个别的具体结论，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个别论述，“就是要将既知的较一般的规律作为研究具体问题的向导”^[8]。正确区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的关系，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具体结论，敢于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 将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将中国的实践经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艾思奇在《中国文化》中发表了一系列哲学方面的文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艾思奇将哲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艾思奇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是“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给予毛泽东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以有益启示”^[13]。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

国的抗战实际,在总结抗战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转变为具有中国经验、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在指导人们的思想行动和夺取抗战胜利斗争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辩证唯物论与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的结合,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合拍。”^[14]所以,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断通过革命实践发展起来的指导理论,要面向现实,发挥其为抗战服务的作用,以丰富抗战斗争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教条公式。重视社会实践,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强调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特殊的意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其本身,不仅是理论上的重大问题,更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强调哲学都有其时代任务,配合着时代的需要,解决实际问题,革命实践对发展哲学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实践推动理论创新。所以他在报刊中发表大量哲学文章,积极推进对哲学的理论阐述和方法论介绍,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科学联系,发展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一步给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学术论证。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艾思奇进行总结,强调抗战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哲学阐发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党内教条主义,与各种反动势力的错误思想做斗争,并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抗战任务。如在文章中阐述新民主主义相关理论,“因为边区实行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政策纲领,是以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原理。”^[15]在《进一步认识中国现实》一文中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只是引导我们去研究活的具体事实的方法指南,而不是摆在前面来裁判一切的教条。”^[10]艾思奇很好地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精华,积极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完善。

3. 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从文化层面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外来文化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生根、发芽、结果的问题,这就需要检视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进行互动并交融,而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复制中国的传统文化。整个过程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提升改造,成为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同样,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的重构整合,更加得本土化、民族化、通俗化和大众化。艾思奇特别指出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充分吸收借鉴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以此阐明马克思主义,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进行提升改造。毛泽东思想中,就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强调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条重要途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思想的载体是语言,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变成中国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能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从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接受能力来阐明,“要使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16]。艾思奇认为首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因为人民群众的语言非常丰富,生动活泼,而且表现的都是实际生活的。“艺术界的工作者要开展到农村、工厂、部队中去工作的运动,努力与实际斗争生活相接触。”^[15]其次,要坚持开放的学术态度,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性。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学习其中的有益部分。当然,对其他国家、民族、政党以及不同人的文化思想也要进行借鉴,学习其中的精髓部分。要认识到自身理论的不足,不断剖析自身局限,善于超越自身理论。“大胆尝试了各种形式的利用,不论新形式、旧形式、中国的、外国的、地方的、民间的、最简单的和最复杂的艺术形式。”^[16]艾思奇认为只要是可以利用的,就没有不可以尝试的,但是要注意各种思想文化的糟粕部分,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吸收,要批判继承和吸收,并且在实践之中不断创新。如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反对封建唯心主义的思想、文化复古主义、反民主、反科学的“伪三民主义”等。同时强调创作的自由,认为“各党派各阶级都各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系统”^[10],他们只要能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基于共同一致的纲领原则，而不是基于完全统一的思想系统”^[15]。强调开放的学术态度，反对教条公式。最后，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通俗化不等同于庸俗化，同时，大众化、通俗化的成效还有待加强。在《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文章中强调，“文化人在群众中的深入工作还不很充分”^[15]，“因此大众化的口号虽然早已提出，而文化工作本身还是不能说已经深入群众”^[16]。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出来，不是要降低质量，而是一方面要求加强实践和创新，将成果以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提升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让他们更容易接受这些理论成果，同时通过教育使得人民群众可以享受更高一级的理论成果。

四、艾思奇在《中国文化》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艾思奇在《中国文化》中发表了多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当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 立足学术前沿，完善理论体系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前进，首先就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艾思奇在报刊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他在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科学理论。”^[4]当代中国，为继续推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就必须站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不动摇。“正因为我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就尤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正因为我们具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现实的特殊条件上来，所以我们就尤其要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4]。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还因为它具有开放性的理论品质。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7]^[4]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第一次在世界上全面突破了思想文化中的地

域性思维方式，开创了一种世界性的具有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借鉴和吸收各种优秀文明成果，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艾思奇在文章中多次强调，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批判不足之处，同时吸收借鉴其他先进文化的精髓。除去理论的阐述，艾思奇自己也不断实践，在报刊中既发表了哲学讲座八篇等专业的学术理论性文章，也有诸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点》《自由亡国论》《<日出>在延安上演》等短评、杂记的文艺理论性文章。即使是学术理论性文章，也多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贴近实际的生动例子来表达。他注重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不仅科学地总结了那一时代的哲学的基本经验，还结合革命需要，对“五四”以来的哲学进行梳理，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通俗化进程起到了示范作用。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富有批判精神的理论，不仅指向外在的对象，而且指向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理论的初期就指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8]^[4]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承认所谓的“永恒真理”和“终极真理”，坚持用批判的态度和精神，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纠正自身的错误，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品格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论证其暂时性指导广大群众并进行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养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之中，也需要公开承认自身的不足，敢于正视自身的理论缺陷，善于超越自身的局限。当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立足学术前沿，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动摇，批判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吸收借鉴各种先进文化，不断更新发展自身的理论，超越自身的局限，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完善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2. 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中国实际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

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9]406}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固步自封的教条,而是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并随着客观实际不断变化的,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但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验证的科学体系和行动指南。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问题导向,探究问题实质,反对实用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探究具体问题的实质,才能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立场去解决问题。艾思奇在文章中多次强调必须要坚持问题的导向,抓住问题的实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外,还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但客观实际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就必然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能教条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夸大实践经验的能动作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曾经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20]67}。想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去正确地坚持它,就必须要学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机械教条地利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的理论公式,“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只是引导我们去研究活的具体事实方法指南,而不是摆在前面来裁判一切的教条”^[10]。要做到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避免对任何问题作公式的主观判断和狭隘的实用要求,就必须“从事实材料的最详密与具体的收集调查着手,应该从事实材料科学研究中找出规律的认识”^[10]。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只有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规律,认清时代的潮流和发展;才能选择恰当的方法、合理的形式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因此,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握问题实质,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3. 把握时代主题, 不断创新发展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1]544}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代条件的产物,而当时代条件发生变化,时代主题发生转换时,马克思主义原本反映特定时代、针对特定情况的一些原理和观点,就会变得不合时宜,从而需要去创新和改变。只有这样,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所以,时代特点和时代进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时代主题的不断变化,既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中国特定的党情、国情和世情以及各种社会主客观条件之下,在特定的时代之中不断随着中国的实际变化而发展的。作为一种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不断获得新的内容,其源泉就是不断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公式理论,其目的是指导实践,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常说他们的学说不是“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即同工人阶级在其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理论”^{[22]93-94}。实践不断推动理论的发展,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不断深入。理论和实践之间相互促进,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成熟,也使得实践不断深化和成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并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艾思奇在文章中,对把握时代主题和加强实践的重要性多次特别强调,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因其不断实践的品格,成为一种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需要实践,但这种实践必须要把握时代主题,不断转换内容和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一种实践,天生就是发展的科学理论,必须重视实践,不断把握时代主题。

五、结 语

艾思奇在《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可能、条件、内涵以及具体途径都做出了系统的论述。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作为实践的指导理论指明了实践发展的方向;作为一种不断实践的理论,又反过来

不断完善理论成果。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从实际出发，促进理论创新，加强社会实践，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艾思奇. 哲学是什么[J]. 中国文化,1940,1(6):28-35.

[4] 艾思奇. 论中国的特殊性[J]. 中国文化,1940,1(1):25-33.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艾思奇. 论质量的互相转变:下[J]. 中国文化,1940,2(4):31-40.

[8] 艾思奇. 哲学是什么[J]. 中国文化,1940,1(4):41-45.

[9] 艾思奇. 什么是辩证法[J]. 中国文化,1940,2(1):39-45.

[10] 艾思奇. 进一步认识中国现实[J]. 中国文化,1941,3

(2/3):2-3.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艾思奇. 论事物的运动变化[J]. 中国文化,1940,2(2):33-39.

[13] 王先俊. “新启蒙运动”期间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3):34-42.

[14] 艾思奇. 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J]. 中国文化,1941,3(2/3):17-31.

[15] 艾思奇. 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J]. 中国文化,1940,1(2):20-30.

[16] 艾思奇. 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J]. 中国文化,1940,1(6):2-4.

[17] 中共中央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On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Ai Siqu to the
Adaption of Marxism to China's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textural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XU Xiao-gua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an official newspaper run by the Culture Association of 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Area in Yunnan period,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journal of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which Ai Siqu was the editor-in-chief and one of the key writers then. In the newspaper, Ai Siqu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to achieve the adaption of Marxism to China's conditions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Pointing out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specific ways, he mad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the adaption of Marxism to China's conditions.

Key words: Ai Siqu;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on the adaption of Marxism to China's condition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编辑 高婉炯】